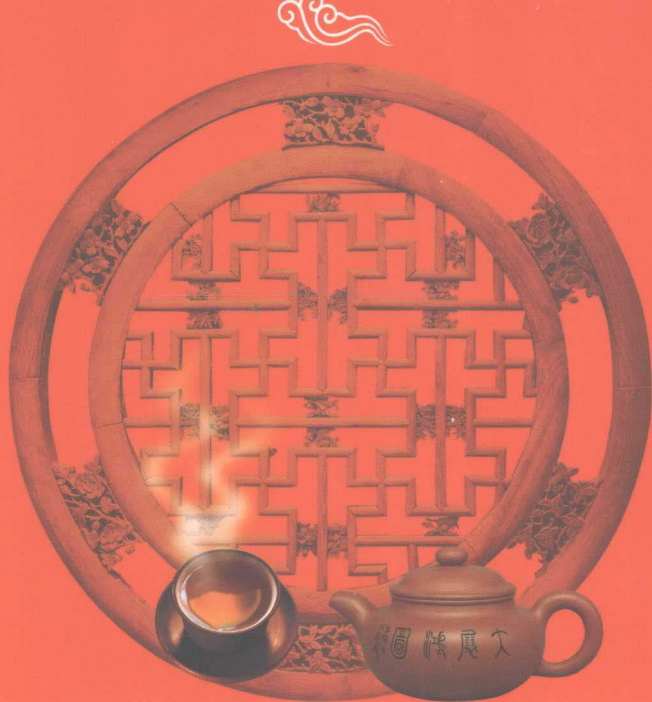




刨根问底 经济闲话

大转型时代的42则经济闲话

赵红军 ● 著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刨根问底 经济闲话

大转型时代的42则经济闲话

赵红军 ●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连

© 赵红军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刨根问底经济学：大转型时代的 42 则经济闲话 / 赵红军著.
—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9
ISBN 978-7-5654-0988-2

I. 刨… II. 赵…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6578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教学支持：(0411) 84710309

营 销 部：(0411) 84710711

总 编 室：(0411) 84710523

网 址：<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dufep@dufe.edu.cn

大连北方博信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字数：149 千字 印张：12 1/4 插页：1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蔡 丽

责任校对：蓝 海

封面设计：冀贵收

版式设计：钟福建

ISBN 978-7-5654-0988-2

定价：38.00 元

中国社会大转型与新一代经济学人的崛起

——序赵红军教授《刨根问底经济学》

韦 森

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这场以对内引入和发育市场与对外开放为主轴的改革，不但引发了30余年的中国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运作方式、人们的交往形式和生存方式，乃至人们思想认识和文化观念的巨大变迁。整体而言，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了。由于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运作中，政府不但没有从经济运行中“脱嵌”出来，而且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调控、干预、参与并驾驭市场，从而也产生了卡尔·博兰尼在20世纪40年代就观察到的一个看似悖谬的奇特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体系之中”了。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当代中国正在逐渐演变生成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经济社会运作体制：一方面，“政府统御市场”；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运行又从属于市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可能比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各国更具有博兰尼所描述的那种“嵌入性”经济社会体制的典型特征。

当然，恐怕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目前中国的这种体制还只是一个“转型体制”，一种“过渡体制”，还不是一个稳定成型的“中国模式”。中国政府领导人和执政党一再坚持说要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足以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是大转型的“现在进行时”。当代中国，需要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需要走向一个良序



的法治民主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这应该说正在成为社会各界的大致共识。

中国社会的大转型，这种由传统社会的小农自然经济以及在传统小农自然经济上构建起来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网络信息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实际上正在重构当今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转变，乃至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上差距拉大，也自然会导致由传统中国社会以及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体制遗传下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社会关系的调整甚至错位，并且带来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判断乃至文化观念上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在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政府的领导和普通公务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市场交换、市场运行，或至少通过市场购买来消费和生存。这样一来，市场运行中每一种变化，以及政府对市场运行调控的每项政策和措施，都往往会触及诸多人的利益，也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评价和议论。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开放了的中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博客尤其是微博的迅猛发展，使得任何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司法、文化乃至消费事件，都会在全国大面积地即时传播，并自然会招来各种各样的议论。在此情况下，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社会，确实正面临着前所未遇的大变局。

在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或言走向尚未十分明朗的大变局之中，尤其是在这种业已演变生成下来的“强势政府统御市场与社会”的体制格局中，任何人都难以预测乃至规划我们经济社会的未来走向，以及进行整个社会体制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每一个中国人，面临着个人和家庭、企业或单位的日常选择，都要对周边所闻所见尤其是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和事件做出自己的应对和评判，也自然会对未来中国当走之路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评论。在这样一个社会格局中，如何判断身边的每一件事情？这现实世界的种种日常事务

又怎样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连接在一起？经济学人又应该如何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如何给予评判？

这部文集，给出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且受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对现实世界的一些日常事务的理论解释。赵红军教授在个人繁忙的经济学理论探讨中对现实世界的一些真实事件和问题所观察和说出的一些“闲话”，是否言之成理？是否正确？你是否同意？那要留待每位读者去品味、判断。但是，作为一位熟知红军博士经济学分析理路，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这些年看着他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年长一点儿的朋友，我可以这样说：红军，作为一名已进入经济学思考的经济学博士和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的思考已经变成了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乃至最主要部分；经济学，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记得我1982年从国内一所大学毕业刚找到一家研究机构的职位时，曾说过这样一句年轻气盛的话：“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现在看来，经济学人应该是经济学的人格化。”今天，当愉快地读红军博士的这部《刨根问底经济学》中的篇篇短论时，我似乎又记起来自己还年轻稚嫩时的“豪言壮语”。这部文集中所汇集的红军博士篇篇平朴、扎实而充满思想和洞识的经济学短论，难道不应当让我们确认“经济学人当是经济学的人格化”这一点？

为此，我诚挚地向广大读者——不管你学没学过经济学——推荐赵红军教授的这本经济学随笔集。

是为序。

韦森于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谨识于复旦

序





前言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在歌剧《浮士德》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长青。”这句话尽管是魔鬼墨菲斯特·费勒斯为了欺骗浮士德而说的一句话，但这不妨告诉人们一个朴实无华的道理——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现实，而现实必定是最鲜活、最真实的。也许有人在听到这句话后会趁机揶揄经济学，既然现实总是最鲜活和真实的，而经济学理论一般都离现实有一定距离，那经济学研究对于现实问题还有什么解释力？更有一则经济学笑话干脆拿经济学家开涮——“什么是经济学家？就是能够解释别人为什么发财，但自己却永远不能发财的人。”其实，魔鬼墨菲斯特说的这个道理全然无错，而恰恰是人们没有正确地理解它。很多人对经济学的如上误解以及这个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恰恰就印证了我的这一基本判断。

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其实它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所谓的经济学（oeconomics），原意是家庭管理或者内务管理。古希腊的经济学家色诺芬（公元前427—公元前355年）在其名著《经济论》中提出，所谓的经济学“可以包括对资源管理的一般原理的研究，不管这种资源管理是个人的、家庭的、企业的还是国家的，还包括对一切管理中发生的浪费现象的检查”^①。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也认为，经济学就是一种家庭管理或者谋生术，“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和国家有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这意味着，古

^① Philip Henry Wicksteed,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p. 17.



希腊时的“经济学”一词不仅指的是家长对于家庭内部事务的管理艺术，而且包括对企业、对国家、对资源和政策的管理。在我国古代汉语中，也有基本类似的说法。比如，“经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但当时是分开使用的，“经”通“径”，称之为“阡陌”，“济”通“渡”，意味着“渡水”，所以分别指代的是田地和渡水两层意思。而只有到了隋代王通的《中说》“礼乐篇”中，“经”、“济”才开始首次连在一起使用，也同样是指“经邦济世”、“经国济民”，也就是管理国家、帮助或管理老百姓的意思。

到了近代，尽管“经济学”一词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但经世致用这一点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比如，在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一词主要是指国家包括民众的收入或生计，也就是广义而言的财富如何增加的学问。其实，更确切地说，斯密1776年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题目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到了第二代经济学大师阿里弗雷德·马歇尔那里，“经济学”仍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但除此之外也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①。在其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这一名著中，马歇尔强调说，经济学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人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虚构的人的生活”^②。他认为，经济学的目的，第一是为了知识而求知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研究；第二是解释实际发生的问题，并且他鼓励理论研究和事实研究相结合。在讲到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对于经济学家的作用时，他说：“实际问题虽然不完全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对于经济学的工作却暗中提供一种主要的推动力。”^③他进一步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私人生活的经济方面和经济情况很有帮助，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

①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③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这种需要可能会变得更加迫切。^① 这说明，尽管经济学研究可以称为“为知识而求知”的理论研究，但它如果不能解释实际发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不能为现实提供任何的行为或政策指导，经济学恐怕就要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了。

马歇尔以后，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十分迅猛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分工日益精细化，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比如，1840年以后，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演进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1870年以后，以杰文斯、门戈尔、威塞尔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主要研究个人消费、交换层面的效用理论；1875年以后，以瓦尔拉斯、里昂惕夫、冯·诺依曼、摩根斯坦、希克斯等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也迅速发展，他们主要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数理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1900年后，以维克塞尔、费雪和霍特里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主要关注了货币和资本的运动规律，以凡伯伦、米切尔和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主要关注制度、政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帕累托、庇古、米塞斯、兰格等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主要关注各类政策对于个人福利、社会福利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以斯拉法、张伯伦和罗宾逊为代表的完全竞争经济学主要关注垄断等经济行为及其对竞争理论带来的影响；1936年以后，以凯恩斯、汉森、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主要关注了宏观经济的长期、短期波动等宏观经济学问题，自此一门崭新的“宏观经济学”得以产生；20世纪40至50年代及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了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它成了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60至70年代及以后，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相继诞生；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

①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学、新贸易理论等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经济学的进展说明，正是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学家通过将注意力关注在小的领域，对研究工具的运用更加专业化，结果经济学研究才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第二，由于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变得日益复杂，因而经济学研究中对于数学、博弈论、计量工具等的运用也日渐增多。这种趋势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数学、博弈论、计量工具等方法的运用，经济学家对于原先难以清楚把握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博弈论的应用使得经济学家对于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国家的战略互动行为、策略性行为产生了深刻的认识；数学对于经济学研究发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微积分的发明使得经济学对边际效用、边际成本这两大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又如，数学的运用使得一般均衡经济学家对于整个经济体的宏观联系有了清晰和严谨的把握。再如，在非线性规划理论产生以前，经济学只研究所谓的边际分析问题，因为边际分析带来的是所谓的微积分可以解决的内点解问题，而对于做这种决策而不做另外一种决策的问题，经济学是无从解释的。但是，在数学上的非线性规划理论获得突破以后，经济学对于此类问题变得可以分析了^①。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应用使得“实证经济学”成为“规范经济学”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分析范式。很多经济学家进一步认为，只有经过这种形式化、数理化地被证明或者被证伪，经济学在成为真正科学的道路上才越来越近。

另一方面，随着这种趋势的普及，经济学似乎有了越来越远离经济学最初强调政策、指导现实和实际经济问题的倾向。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批评说，社会科学研究人类行

^① [澳] 杨小凯：《超边际分析与新兴古典经济学》，21～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为的特征决定了精确数学公式与证明的脆弱性所在^①。又如，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计量经济学一般要求大样本数据的支持，可是现实中大样本数据这一条件严格而言是很难满足的。此外，经济学与那些可重复试验的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毕竟经济学家所收集到的数据是预先决定的或者预先设计好的，因此是否能直接用于检验也是个问题。还有，经济学家也不可能让经济体的人、企业重复一遍此前所从事的活动，也即进行一个重复的试验以检验某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另外，对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而言，大多数的经济数据都是由政府的代理机构出于政治原因而不一定是有针对性的目的而收集的^②，因此，这种数据的性质对于计量分析工具的使用等就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笔者认为，经济学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一种经世济民、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的先天情怀，并且随着时代的延续，这种关怀并没有消失。经济学家、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普通大众所看到的经济学家那些越来越重视数理化、实证化、复杂化的学术发表，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因为这些高深的学术发表、这些专业化的研究恰恰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学的研究已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了，毕竟在当今这个世界非常复杂的世界上，如果经济学家不坚持“学术有分工、术业有专攻”这一分工和专业化原则，那么究其一生，他们可能也研究不出什么新的或者更加深刻的东西来。此外，经济学的初学者、白领、工人、新闻工作者以及社会大众也必须清楚，经济学家出版、发表的这些文章、著作中那些比较专业化、比较高深的内容都是给他们的同行而不是普通大众看的。他们之所以那样做，目的大致有两个：一个是通过这种专业化、高深和精细化的工作，促进学术交流，促进经济

① [美] 小罗伯特·B. 埃克伦德、罗伯特·F. 赫伯特：《经济理论与方法史》，杨玉生等译，4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② [美] 小罗伯特·B. 埃克伦德、罗伯特·F. 赫伯特：《经济理论与方法史》，杨玉生等译，4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学以及经济学教育在某一专业化领域的进步与发展；另一个就是通过这些学术发表，奠定他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地位和声誉。换句话说，经济学家所出版的、发表的这些学术著作可能恰恰就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阳春白雪”，而普通大众想看的、能够读懂的经济学则是经济学关注现实、联系实际的那部分大白话、大实话。可惜的是，在两部分之间，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鸿沟。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科班出身，是由具有较少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队伍组成的，他们的强项在于理论和学术研究，而这些理论和学术研究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又是如此重要，因此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前，他们只有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通俗化工作，所以普通大众看到这些通俗化作品的机会就相对较少；二是从“阳春白雪”到通俗化之间还的确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跨越。那些强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人士，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与现实经验作为支撑，还的确面临着难以将自己的作品通俗化的障碍。对于这样的工作，也许只有靠那些具有较丰富经济和社会经验，同时又比较熟悉经济学理论研究前沿，并且有意愿与精力，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经济学家来完成。

笔者不才，但愿意从事这样的通俗化工作。在此，先让我讲述一下我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我具有从事这一工作的基本经验和理论储备条件。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典型的“70后”。我上小学的年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7年，上初中的年代是改革开放已经风起云涌的1983年，上高中的年代是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上大学的年代是中国城市和企业改革、外汇体制和外贸体制改革相继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1993年毕业后，我带着对经济改革的美好憧憬，带着多年累积的对财富的饥渴，冲进了火热的现实之中。在毕业后五年的工作中，我曾经是国有外贸企业的外销员，亲自干过外销员兼验货员兼商检员兼运输员的基层工作，还曾经由于公司的巨额亏损而在两年内领不到一分钱工资，

只好贩卖白色的面粉、灰色的水泥、红色的辣椒和绿色的苹果等农副产品以维持生存。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见过狡猾的商贩、精明的行政人员、老奸巨猾的官员、朴实的老百姓，而且通过多年在基层的打拼，我逐渐认清了自我。我发现，我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想法，不安于现状的小伙子。1998年，在工作了五年之后，我毅然决定放弃工作并拿起了多年没有拿过的书本，并于1999年开始了我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生涯。用比较书面的、比较振奋的话说，我主动放弃了工资待遇，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但用咱老百姓自己的话说，我读研究生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这样，1999—2002年，我坚持脱产读研究生，假期就拿起自己经商时积累的经验，替一家外资企业打零工，从事销售管理工作。再后来，我开始到复旦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接下来就来到了上海财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积极争取国家的留学基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了一年。从实践经验到理论储备，我认为我具有了很多经济学家不具备的经济学理论通俗化的经验和理论储备兼相应的经验条件。

其次，从1997年我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1999年发表经济学通俗文章以来，我一直坚持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举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精读国内外最前沿的中英文经济学文献，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学术传承工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约30篇学术理论文章；另一方面，我还经常将自己工作、学习、生活中的点滴体验整理成各种各样的小品文，先后在《经济学消息报》、《中国经济时报》、《财富时报》、《珠海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学家茶座》、《新经济》、《财富与管理》、《读者》、《青年文摘》等通俗的经济学报刊上发表若干篇通俗性的经济学文章。这些通俗性文章的发表，以及自身与政府、企业的密切联系，也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了很多新的创作素材。此外，我作为民主党派人士，还经常利用自己的经济学体验，自己对国内外经济问题的了解和感知，为地方政府、政协写过很多受到重视的政策建议和意见。通过不断的历练，我





对经济学通俗化、普及化的工作也有了比别人更加深切的体会和经验。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这样一本关于日常生活中种种真实现象、反常现象、深层次和容易被普通大众忽略的现象与问题的经济闲话集。收在其中的文章，几乎全部是我近年来的亲身经历，或者在工作、学习以及研究中深切感悟到的，又与普通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学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我将这些闲话按照话题大小从微观到宏观划分为以下七章：

第一章为“家长里短”，主要讨论了孩子成长的经济学、买房前后“房奴们”的心路历程、上海人的精明之道、节日送礼、毒誓不算一项好的制度设计、老夫少妻等家庭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这些主题的讨论，读者可以清楚经济学对于我们生活中很多经济、社会问题的强大解释力，同时也能体会到经济闲话带给你、我、他的那种趣味与深刻体会。比如，《节日送礼的经济学》一文虽写于2002年，但这个主题是中国人每逢佳节时的永恒话题。在其中，读者能够体会到送礼问题的成本与收益，送礼所折射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同时，笔者在文章的最后还给出了送礼的一些可行性建议，对于引导国人的消费和送礼习惯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又如，《我成为房奴》记述了我成为房奴前后的心路历程，我与房产中介打交道的过程，我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分析，对于精明卖房人的评论，从中读者不仅可以体会生意场上的狡猾与伪善，而且也能体会到普通老百姓在买房前后所承受的那种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

第二章为“生意内外”，主要围绕着企业的员工招聘、外国银行处理顾客异议、我国银行业过度发卡所透露出来的银行业问题、上海世博园不提供开水的经济理由、财富是否能圆快乐梦、亏本的生意谁来做等生意人经常碰到或见到的经济问题。比如，《老板喜欢什么样的下属》来自我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与邻居老太交往、交流的经验，也透露了中美老板对于下属的不同选择以及中西管理文化的巨大

差异问题，这篇短文对于那些即将留学或者涉足外资企业的读者而言肯定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花旗银行，让我吓了一跳的银行》来自于我在美国的花旗银行账户被盗的亲身经历，从中读者不仅可以比较中美银行对于顾客投诉的态度、做法之异同，而且对于那些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或者那些经常出差到国外以及经常采用网购方式购物的朋友都是一种很好的提醒；《财富能圆快乐梦吗？》一文从国外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有关快乐的经济学的研究的最新进展出发，讨论了财富不一定能带来快乐这一经济学问题，并从国内外的经验出发，给出了我国老百姓如何正确看待财富，如何在有限的财富基础上获取更多快乐的实用性建议。

第三章“人在旅途”，主要是我在回家路上、访问美国和意大利高校、去加拿大开会或者参观上海世博会时的所见所闻及其所引发的经济闲话。比如，《列车员卖小板凳与供求》一文描写的是我春节探亲回沪路上亲眼见到的列车员卖小板凳的故事及我运用经济学供求理论对这一现象的精彩分析。这篇文章是我读研究生时发表的第一篇通俗性文章，发表在当时影响颇大的《经济学消息报》上。之后，这篇文章在该报上还引发了其他作者的反驳。后来，这篇文章多次在我给本科生讲授的“微观经济学”课堂上作为案例进行讨论。再后来，这篇文章被放在我的博客（均衡之美：<http://hjzhao.blog.sohu.com>）上，又引发了一位医学博士与我关于这篇文章的激烈争论，想必本书出版社后也可能会引发读者的评论。又如，《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一文是我在美国访问期间，通过对美国一年多的感知所写的一篇通俗性文章。它最初的想法来自于我推荐的一名去美国留学的学生给我的电子邮件。这个学生出生在上海，是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可是当他经过一番托福、GRE 的艰辛考试并来到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用他自己的话说，“美国简直是个偌大的农村”。在收到这封电子邮件之后，我专门撰写了此文，并对学生的疑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这篇文章在《经济



学家茶座》发表之后，先后又被全国 10 多家杂志，包括《读者》以及数不清的网站转载。这篇文章与目前很多有关美国即将衰落观点有所不同，对于读者如何正确地看待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经济和综合实力有所帮助，同时对于中国如何更好、更快地崛起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章为“刨根问底”，主要是笔者对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正常、别人很少注意到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比如，经济学能不能研究生男生女问题？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对夫妻婚后面临的家庭决策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是孩子的父母可能也很难作出选择，但笔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印度等国家存在的性别选择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并且这种现象在农村和城市环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其实对于我国今后的城乡性别平衡、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又如，在普通读者的生活中，可能没有几个人关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为什么存在编制”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似乎是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已确定下来的事情，但笔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以后就发现，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资金来自上级拨款而不是自负盈亏，因而，它们通常就会有一种不断自我扩张的天然倾向，所以，国家就会通过编制这一制度来控制它们的规模；原因之二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在进入单位的时候通常都是依托着各种关系进来的，因而这些人一旦进入单位以后就很难离开这些单位了，于是这些单位的规模通常就会不断膨胀，这也使得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编制控制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与经济学界多年以前的一个经典问题

“软预算约束”^①密切相关，对于理解我国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为“宏观追问”，主要是笔者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闲话，比如过去六年的物价变化、上海地价过高的连环危害、美国经济是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金融行业是否天然不稳定、为何诞生了鲁班的我国国家具制造业仍落后于西方、改革开放以来三个乡的兴衰变迁等。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普通的老百姓不仅会对与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与体会，而且也会对我们生活中的金融市场、中国国家具等制造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比较优势、比较劣势有清醒的认识，这对于大家今后的生活或者工作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六章为“三思而行”，主要是笔者关于我国各级政府有关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中的相关政策或者做法的经济闲话。比如，《法院安检能否三思而后行？》就讨论了最近几年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法院安检这种现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问题，诸如：“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执法机关法院都如此害怕安全问题，老百姓到底还怎么办？”通过这个案例，笔者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做法的欠妥之处，并给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与措施，这对于维护我国法院的形象、增加公民的认识和安全感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又如，《大学城地铁站规划以什么为本？》，就讨论了地方政府在地铁规划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问题。一方面，世界各国的普遍原则是“以人为本”，体现公共服务的最大效用原则，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要考虑建造成本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可能，甚至这一复杂的决策

^① 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雅什·科尔奈在1979、1980和1986年分别提到“软预算约束”这个重要概念，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政府而不是企业自身积累，因而国有企业通常就会面临着激励不足的现象；相反，民营企业由于其经营的资金来自于自身的经营盈余，因而从长远看，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激励去改善效益。有关“软预算约束”等相关深入讨论，可参见：Kornai, Janos,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0; Kornai, Janos,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1986, 39 (1), pp. 3-30.